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 中国政治文化教程

葛 荃 著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 中国政治文化教程

葛 荃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内容简介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作者借鉴现代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理论来介绍和分析中国政治文化。本书包括以下内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结构；中国政治文化关于人本质的自我认识；士人的生存样态、政治出路、政治心态以及从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路径；君子、小人、狂狷、乡愿、伪君子等传统政治人格；臣民观与公民观；公私观念与“以公民为本”问题；君臣政治道德与贤人政治；忠孝道德与传统义务观；政治制衡观念与政治运作；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化问题；中国政治文化的思维定式与思维特点等。作者研究的层面主要涉及政治价值、政治观念、政治心态、政治人格、政治道德、政治社会化以及政治思维定式等等。本书汇集了作者 20 多年专业研究成果，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剖析，具有鲜明的学术性，既有助于扩展学生的专业知识领域，又能够使其深入了解中国政治文化、提升现代意识。本书既适用于高等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历史、法学等专业教学，亦可作为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参考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政治文化教程/葛荃著.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5

ISBN 7-04-019130-X

I . 中... II . 葛... III . 政治-文化-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 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5949 号

策划编辑 周亚权 责任编辑 金学影 封面设计 刘晓翔  
版式设计 王艳红 责任校对 俞声佳 责任印制 朱学忠

---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 - 58581118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免费咨询	800 - 810 - 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a href="http://www.hep.edu.cn">http://www.hep.edu.cn</a>
总机	010 - 58581000		<a href="http://www.hep.com.cn">http://www.hep.com.cn</a>
		网上订购	<a href="http://www.landraco.com">http://www.landraco.com</a>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a href="http://www.landraco.com.cn">http://www.landraco.com.cn</a>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畅想教育	<a href="http://www.widedu.com">http://www.widedu.com</a>
开 本	787 × 960 1/16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20.5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80 000	定 价	25.30 元

---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19130-00

## 郑重声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版权。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行为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读者误用盗版书造成不良后果，我社将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侵权行为，希望及时举报，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反盗版举报电话：(010) 58581897/58581896/58581879

传 真：(010) 82086060

E - mail: dd@hep.com.cn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打击盗版办公室

邮 编：100011

购书请拨打电话：(010)58581118

# 目 录

<b>导言</b>	1
一、现代政治文化研究概说	2
二、传统中国“道”的专制	18
<b>第一讲 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结构</b>	28
一、价值与政治价值	28
二、传统政治价值结构	29
<b>第二讲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b>	58
一、人性自觉与人的本质	58
二、“人道”原则与对个体人的压抑	61
三、圣化：人的价值的实现	66
四、结语：主体意识的断层与民族精神	71
<b>第三讲 士人的政治存在与政治心态</b>	74
一、道与王的同一和冲突	75
二、孔子的选择与士人的政治存在样态	80
三、士人阶层的从属参与型政治心态	87
四、从士人到知识分子	90
<b>第四讲 传统政治人格</b>	100
一、从等级身份到政治人格	100
二、小人人格的“反道德”特质及其政治表现	103
三、君子人格的道德特性与政治功能	110
四、乡愿与伪君子	122
五、内圣外王：理想人格与理想政治	132
<b>第五讲 从臣民观到公民意识</b>	148
一、君主政治与臣民观念	148
二、“尽人皆奴仆”的臣民心态	154
三、在实践中学会做公民	156
<b>第六讲 中国传统的“公私观”与“以公民为本”</b>	162
一、第一层境界：“以君为本”的公私观	162
二、第二层境界：“以民为本”的公私观	167

---

三、第三层境界：“以人为本”的公私观 .....	174
四、从“以民为本”到“以公民为本” .....	175
<b>第七讲 君臣之道与贤人政治 .....</b>	<b>179</b>
一、为君之道 .....	180
二、为臣之道 .....	194
三、贤人政治与清官期盼 .....	200
<b>第八讲 忠孝之道与传统义务观 .....</b>	<b>212</b>
一、忠孝三境界 .....	212
二、忠孝之道的逻辑统一与实际选择的两难性 .....	219
三、忠孝义务与极度扩张型亲情义务观 .....	222
<b>第九讲 政治制衡观念与政治运作 .....</b>	<b>228</b>
一、西方文化中的政治制衡观念 .....	228
二、中国传统的制衡观念及其价值构成 .....	232
三、中国传统制衡观念的困境与观念的转换 .....	236
<b>第十讲 传统中国的政治社会化 .....</b>	<b>249</b>
一、“政治社会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社会化 .....	249
二、教化之道 .....	257
三、政治录用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与庸人体制 .....	274
<b>第十一讲 中国政治文化的思维定式与思维特点 .....</b>	<b>281</b>
一、政治思维定式 .....	281
二、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特点分析 .....	303
<b>第十二讲 走出王权主义的梦魇(代结语) .....</b>	<b>317</b>
一、王权主义提出的政治学价值 .....	317
二、王权主义提出的政治文化研究价值 .....	318
三、走出王权主义的基本思路 .....	320
<b>后记 .....</b>	<b>322</b>

# 导言

中国的智慧古老而悠远。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诗人就吟唱出这样的诗句：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它山之石，可以攻玉<sup>①</sup>。

这是诗人的生活感触？是寄托着诗人的政治期盼？还是在传递着什么奥秘或信息？战国末年，儒宗荀子解曰：“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此之谓也。”<sup>②</sup>是知古代诗人以诗歌来抒发感怀，用为“比兴”，表达了贤才有待明君眷顾而得以入仕的政治期盼。

今天，当我们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审视传统，我们看到，在诗人的吟诵中蕴涵着这样的文化符码：不同质的事物交互作用，将会达成新的事物；工具或方法的更新，将会解开原有的难题。如若从人类认识的发展来看，大凡认识的创新常常孕育在认识和思想的异质性之中，人的思维的升华正是在石与玉的撞击或琢磨中迸发出来的。

因之，从民族文化的立场来看，域外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撞和交流，必然会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会促成一代人的认识更新。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正是从中国文化中找到了批判欧洲中世纪传统的思想武器，东方的孔孟儒学、老子道家以及中国的文物典章等，为启蒙思想家们各种学说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的借鉴。例如，伏尔泰借鉴了儒学的恕道，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形成了自然神教的思想基础；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则得到了儒学经典《周易》和宋儒“理气观”的启发；宋明理学的“天理”学说和儒学的理性精神为启蒙学者们冲破宗教神学的精神束缚，高扬理性权威提供了动力。正如伏尔泰所言：“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sup>③</sup>无独有偶，19世纪中国的先进人士们也正是从西方文化中找到了打开君主政治精神枷锁的钥匙，开启了中国近代文明。《富国论》、《物种起源》、《法意》、

① 《诗·小雅·鹤鸣》。

② 《荀子·儒效》。

③ [德]科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9页。

《独立宣言》的东渐，在封闭的东方唤起和造就了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他们高擎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呐喊、奋进，成为中华民族为摆脱专制而跋涉百年的开路先锋。显而易见，人类的文明史已经表明，文化的交融所形成的推力能够冲垮思想禁锢的壁垒，开拓出一片新天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借助于现代政治学理论的“他山之石”，重新“研磨”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政治。

## 一、现代政治文化研究概说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论域，政治文化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不过是近 40 年的事情。一般认为，美国政治学家 G. A. 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在 1956 年发表的《比较政治系统》一文中率先使用了这个概念；嗣后，政治文化逐渐被政治学界广泛接受，成了一个令人兴趣日增的研究课题，迄今已有数十种专著问世。

政治文化生成晚近的特点表明了这个领域无非是现代科学主义的产物，准确地说，是伴随着人们称之为“行为主义革命”的新思潮而生成的。

如果我们稍稍追溯一下政治学研究的发展史，我们就会清楚地了解到，在欧洲中世纪之前，政治学基本是哲学和伦理学的附庸，许多颇负盛名的政治学理论家首先是哲学家。这一时期的政治学研究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一些理论命题进行论证，政治思维有着强烈的伦理色彩。例如，西哲柏拉图对于政治的认识就贯穿着道德性，他以道德标准将人划分为三等，其中，治国者代表智慧，卫国者代表勇敢，劳动者表现为贪婪。他认为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成为国家的最高政治领袖，因为只有哲学家才具有完美的德行，他的智慧使他足以洞解正义，从而得以依照“正义”的最高道德准则去治理国家，而正义的实现恰恰是政治的最终目的。再如，被称为“政治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也以“善业”的普遍实现作为他的政治目的，又以“正义”作为最基本的政治原则。他说：“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sup>①</sup>显然这一时期的政治认识尚没有超出价值哲学的视域。

欧洲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近代文明的崛起，政治学研究的坐标从道德价值转向了国家、政府、制度和政治权力本身，诸如国家与法、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结构及基本人权等成了人们思考的热点，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传统政治学”。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采用演绎的方法，关注的是政治的规范、标准和价值，亦即政治的“应然”方面；至于政治的“实然”方面，亦即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活动着的具体的人，却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

<sup>①</sup>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9 页。

20世纪初叶兴起的科学主义思潮把政治学研究推向了现代社会科学的行列。基于科学主义的思维方法<sup>①</sup>，有人提出政治学不仅仅是思辨的理论阐释，而且应该是为了真理的发现，阐释并证明实际存在着的基本政治规律与规则。1908年，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 沃拉斯，一译华莱斯)出版了《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他批评说：“政治学的研究目前正处于非常令人不满的境地。”他认为，“目前差不多所有研究政治的人都分析体制而避免分析人”<sup>②</sup>，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在他看来，人的理智是有限度的，在政治生活中，人常常不是凭借理智，而是在情感或某种心理的作用下做出反应或选择。因此他主张研究政治中的人，把人性、人的心理、人的行为和人的政治活动的规则、规律作为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沃拉斯的主张在政治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回应<sup>③</sup>，人的活动和行为日益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一学术发展趋势正是人们所说的“行为主义革命”。

行为主义革命本质上是方法论的革命，它意味着人们在思维上突破了哲学的束缚，转向了科学；学者们走出了文书档案，开始面向丰富而鲜活的政治现象。这种方法将传统的静态研究变为动态研究，主张采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及其方法论来推动政治学研究，提倡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人的实际行为。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政治学走出了以往的国家、权力、法制领域，研究的热点集中在选民行为、公众舆论、利益集团、政治心理、政治人格等方面，力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对于政治现象更具解释能力的现代学科。

政治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生成的。

### (一) 现代政治文化的一般理论

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发展来看，政治文化的缘起甚早，几乎与欧洲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sup>④</sup>。然而，作为政治学的政治文化概念则是由美国学者G. A. 阿尔蒙德提出来的，他用这个概念来概括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政治意识”以及“政治行为的选择倾向”等，以此说明隐藏在宏观政治现象背后的微观因素，希望藉此能对人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为做出更为深入的揭示。也就是说，在通常人们已经注意到了的宏观政治现象和人的政治行为背后，还存在着不为人知

① [英]门罗·史密斯(Munrot Smith)提出，任何一门能称为科学的学科都必须实现两个目标：其一，目的在于发现真理；其二，能够证明其基本规则。

② [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页。

③ 与沃拉斯相呼应的学者有美国的Arthur Bentley、Charles E. Merriam、William B. Munro、G. Catlin等。

④ 据[英]M. 勃林特在《政治文化的谱系》一书中的分析，政治文化研究的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的内在文化因素,阿尔蒙德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虽然不能说与广义上的文化没有关联,但是毫无疑问,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独立的学术论域,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 1. 概念界定。

关于政治文化的概念界定,迄今已有数十种,学者聚讼不已,尚无定论。我们且举出三种以为例。

其一,G. A.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sup>①</sup>

其二,L. W. 派伊(Lucian W. Pye,中文名:白鲁恂)认为:“政治文化乃由人们对政治过程之累积性的取向所构成,它包括社会权力与权威结构的现状,计算与估量因果关系的规范,价值群和情感反应的模式所形成的限制。”“政治文化乃由界定政治行动所发生的环境的经验信念、表征符号与价值所组成。”“政治文化乃由赋予政治过程以秩序和形式(order and forms)的特殊取向模式所组成。”<sup>②</sup>

其三,W. A. 罗森邦(Walter A. Rosenbaum,一译罗森堡)认为:“政治文化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界定。假如我们着重个人,则政治文化基本上是以心理为焦点。它包括个人主观上对政治系统之基本要素的态度取向的所有重要的表达方式。我们想知道他对构成社会的基本政治秩序的符号、机构和规则的感觉和想法,以及他如何加以反应……政治文化的第二个定义,指人民对于政治系统的基本要素的集体态度取向。这是一个‘系统层次’的研究途径。我们的兴趣在探讨一大群公民如何评价他们的政治制度和官员。”<sup>③</sup>

以上的征引代表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政治学界的认识,总的来看,他们把政治文化看作是政治中的主观因素,涵指政治活动中的人的主观意识领域,包括人们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信仰、情感、认识、评估等。这种界定的着眼点是个人的心理取向,与苏联学者的认识大相径庭。这里我们以苏联学者 H. M. 凯泽罗夫的观点为例。

凯泽罗夫认为:“政治文化是一种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现象,一种特殊的文化,是精神实践活动与某种关系的一定的质和方式,这种关系保证根本的阶级利益得以反映、巩固和实现,其途径是建立一定的政治观点、价值、知识和素养体

<sup>①</sup> [美]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sup>②</sup> 唐光华:《政治文化的沉思者——白鲁恂》,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84、85页。

<sup>③</sup> [美]罗森邦:《政治文化》,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页。

系,是通过公民参加社会政治生活、保证社会政治体制、规范、传统体系的实行、发展与继承。”<sup>①</sup>从凯氏的有关表述来看,他主要坚持了两点。其一,政治文化的上层建筑属性:“政治文化无论具有什么形式,无论它与物质的关系即经济基础关系看上去如何交错复杂,它主要的决定性的特点是上层建筑属性。”<sup>②</sup>其二,阶级本质:“政治文化是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反映和实现的特殊形式,这种利益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和由这种地位所规定的需求的直接反映,是客观存在的现象。”<sup>③</sup>显而易见,凯氏的政治文化更像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狭义的政治文化。

我们认为,在政治学意义上研究政治文化,应该以阿尔蒙德、派伊等人的界定为基准。一般而言,政治文化是政治中的主观因素,指的是一个政治系统赖以生成和运作的文化背景与条件,包括政治价值、政治观念、政治信仰、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当政治文化对政治主体形成影响,表现为某种政治取向即选择倾向时,它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群体的、集团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互为因果,是政治权力结构与制度的内在机制,是宏观政治现象背后的微观因素;如果说,人作为政治的主体具有某种恒定性,那么政治文化的研究就总会是有意义的,因为政治文化的研究视域正是人的内心世界。

## 2. 构成要素。

既然政治文化是政治中的主观因素,那么它的构成就不能不带有思想认识的特点。如能摄其大要,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政治认知成分,指的是人们对于政治系统、政治领袖、政治活动及政策的认识。人们运用判断、推理、想象、联想等方法形成对于各种政治现象的了解和理解,构成了政治主体的政治选择与政治行为的主观性依据。政治认识的差异性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包括经济、历史、政治、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政治主体的具体条件等。

政治认知的理性程度与人的政治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模糊的政治认识往往导致政治参与意识的弱化和不确定,明确的政治认识是促成明确政治行为的前提。

二是政治情感成分,即人们对于政治领袖、政治权威及政治系统的好恶、憎恨、忠心、淡漠等感情。政治情感的形成取决于多种条件,诸如社会政治地位、人生际遇、政治交往,或是理性认知、价值追求、道德理想、政治信仰,甚至某一突发事件的影响等。政治情感有着明显的非理性色彩,受到政治情感制约的行为选

<sup>①</sup> [苏联]《社会学研究》1981年第4期。

<sup>②</sup> [苏联]《社会学研究》1981年第4期。

<sup>③</sup> 《苏联国家与法》1984年第2期。

择也大多带有非理性的特点。

政治情感的形成和表达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某一群体或集团,有时也会形成全社会的政治情感倾向。

三是政治价值观念。简言之,政治价值是一种评介标准,是政治主体借以认识政治现象,评估政治问题的依据和尺度。政治价值一般通过人们的政治观念表达出来。

政治价值可能普遍地存在于某一共同体的政治文化之中,也可能是某一政治主体个人所独具的。对于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而言,政治价值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通常需要数代人甚或千百年的承传积淀。对于个人来说,政治价值观念的形成无非是一个政治社会化过程。

四是政治理想与信仰。政治理想是对政治前景的设计,是对未来政治局面的憧憬。在民族的政治文化体系中,政治理想是人们进行政治活动的目标,也是激发人们积极参与政治的精神动力。对个人而言,政治理想是促使其做出选择的重要根据。

政治理想转化为政治信仰,会形成一种坚定的、笃信不疑的政治信念,对于个人或群体的行为选择都会形成极大的强制力。

### 3. 政治文化的结构。

政治文化具有结构性,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常常是由不同的亚文化层次构成的。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都可以区分为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两大阶层,与之相应,也就形成了两种政治文化的分野,可以称之为统治政治文化和民众政治文化。前者指的是统治或管理者阶层对于自身在政治系统中的位置及作用的认识,以及相应的政治态度、观念、情感和信仰等。后者指的是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自我意识,以及对于诸般政治现象的认识、态度、信仰等。

在政治权力私有即专制政治条件下,统治政治文化对于民众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引导和控制作用,表现为某种文化上的强制和主宰。据此,我们把那些对于全社会具有控制力的政治文化称为主体文化;其他的文化层次,譬如民众文化则是亚政治文化。

由于人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位置不同,从事的具体职业不同,人们往往从各自的特定角度形成了对于政治现象的认知和评估标准、政治态度及表达方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职业亚文化。这种文化现象不只是近、现代社会才有的,事实上,由于古代社会的职业常常与等级身份相连,由此而形成的亚文化特点往往更加凸显。

同辈集团由于年龄相近,他们往往具有相近或相同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态度和政治取向即选择倾向,从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亚文化层次。这种亚文化常

常可以超越种族、职业和经济政治地位的局限,构成一代人的文化特色,对同一代人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为有着强力的影响。

此外,还有种族、地域亚政治文化等。

#### 4. 政治文化的类型。

依据划分类型标准不同,可以区分出各种政治文化类型。

例如,根据主体政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以及诸种亚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划分出以下三种类型的政治文化:

冲突型政治文化。一方面是主体政治文化及各亚文化均得以充分发展;另一方面是政治系统受到某一个或少数几个利益集团的控制,不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常常是在这种情况下,各文化层次之间会形成激烈的冲突。发生冲突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经济或政治利益分配、种族或民族观念、政治立场或信念信仰等。

协调型政治文化。主体政治文化与各亚文化之间有差异,但不存在基本价值、政治原则和政治信仰之间的冲突。文化差异则可以通过某种途径相互适应,也可以通过政治系统或其他方式进行协调。这是理想的现代主权国家的理想政治文化局面。

混同型政治文化。亚文化的发展不很充分,各亚文化之间的界限不甚分明,基本上处于主体政治文化的控制和主宰之下。政治关系与血缘关系、种族关系、宗教关系等交缠在一起,政治冲突表现为单一的权力及利益冲突,这样的政治文化类型显然是比较早期的和传统的。

再如,依据社会一般成员对政治的认知程度,则可以列出以下三种类型的政治文化:

地方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的大多数缺乏必要的政治认知,对于政治系统、决策过程以及自身的政治地位、政治能力等茫然无知;或是仅仅对国家、政府(官府)有一般性的了解,但对于具体的政治过程是完全无知的。人们缺乏对于国家的政治情感,不具备对政治的评估能力。他们往往对本地区的公共事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参与取向,但是对于超出本地区的事务却没有热情,对国家政治系统没有什么希求,也感觉不到政治过程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人们遵循的是传统习俗或宗教法规,对国家政治是不参与的。

臣民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系统和政治输出(export)有着明确的认知,能切实感受到政治统治对于自身生活的影响,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政治评估能力。但是,人们对于自己在政治系统所处的位置和政治参与能力几乎没有认知,对于政治输入(import)即政策制定的运作过程很生疏。这种类型的政治文化使人们长期处于被动的政治地位,没能形成积极参与政治的自觉性。

参与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普遍具有明确的政治认知,对于政治系统、政策

制定过程以及自身的政治地位、政治能力等都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因而人们多半有明晰的情感表达,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政治评估能力。当然也有人对政治采取了不参与的态度,但这不是由于茫然无知,而是出于一种明确的选择。他们对于自我的政治角色认识得很清晰,尽管他们很可能拒绝承担角色。

事实上,政治文化类型是政治学家们为了研究的方便而采用的认识方式,如果区分的标准是无限的,那么政治文化的类型也是没有穷尽的。譬如:

以政治文化的内在一致性为标准,可以分出:同质性政治文化、异质性政治文化;以社会成员的政治信念性质为标准,可以分出:意识形态型政治文化、实践型政治文化;等等。

如果具体到某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其实际的文化类型并不是单一发展的,而是常常处于混合并存的状态。因而所谓政治文化类型只是为了方便研究而已。

### 5. 政治文化的功能。

就广义而言,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的文化基础。一方面,政治文化的形成受到政治系统的影响;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又影响着政治系统的运行。政治文化对于实际政治生活有着巨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变革政治系统,促成改朝换代。从世界范围的历史过程来看,一般而言,每一次政治上的变革,亦即所谓改朝换代、政权更迭,都将伴随着政治文化的变革;而且,文化的变革往往是政治革命的前奏。政治价值、政治信仰以及意识、情感等方面彻底改换是促成改朝换代的前提条件。

其二,维系政治关系,维护政治秩序。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相对稳定的政治价值观念以及信仰、情感等无疑会给政治系统和政治的运行提供稳定的文化保障,维持各种政治关系之间的相对和谐与稳固,从而起到维护政治秩序的作用。这一方面取决于具体的政治和历史条件;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政治文化本身的结构与特性,取决于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的适应及协调的程度。

其三,评估政治现象,指导政治行为。政治主体置身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中,经由某种方式摄取政治文化,形成了各自的政治观念、政治信仰和政治心态,表现为不同的政治态度、情感和选择。在一般情况下,政治主体的行为与选择无不受到政治文化的强制作用,也就是说,政治主体对于自身在政治系统中的位置和作用的认识,他的政治意识与政治价值观念,对于政治领袖及政治系统的政治情感,以及他的政治信仰等决定着政治主体对国家、政府、领袖及政策等方面的评估和认同,影响着政治主体的国家归属感和政治忠诚的程度;同时,也影响着政治主体的行止反应和政治行为模式。

### 6. 影响政治文化的条件。

所谓的文化都是具体的,每个民族的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总是要受到一定的条件或某些特定因素的制约。大体而言,以下七种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一是社会即民族的总体文化。政治文化的学术归属固然属于政治学领域，但广义而言，政治文化仍然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大文化的一个亚文化层次。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包括伦理观念、民俗民风、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发展必然会影响到这些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正是由于社会总体文化与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促成了各个民族政治文化的个性与差异。

二是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生产的形式以及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对于政治文化的类型与特征有着深层的制约作用。譬如在小生产条件下，社会经济基本处于自给自足和相对封闭的状态，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政治文化的发展多半会导向地方型或臣民型，我们很难想象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会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形成。经济结构对政治文化的影响已经被人类的文明史证明。

三是政治历史沿革。政治文化具有的民族性意味着该文化是伴随着民族的成长历程逐渐形成的，这样就必然会受到政治传统的影响，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会与民族的政治历史沿革相呼应。我们只要对中国、美国及英、法等欧洲国家的君主政治和革命的历史略加比较，就会明白中、美、英、法的政治文化何以如此的不同。

四是政治系统及其政治运作方式。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政治系统都有其各自的结构特点和运作方式，政治文化当然会受到政治系统的影响。君主政治的专制政治系统、军事独裁的极权政治系统以及共和政体的民主政治系统之间不仅仅是政治体制或政治运作的差别，而且会影响到各自政治文化的异同。事实上正是不同政治系统以及相应的政治生活方式创造了各自的政治文化。

五是社会文化环境。一个民族在成长的历程中，经常会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发生接触、碰撞、融合或影响，形成不同文化之间的涵化(assimilation)。由于各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异，不同的文化组合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的特点。在现代社会，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冲突或交融极为普遍，这也会影响到本民族政治文化的持续、变革和冲突。

六是地理条件。地理条件对于古代民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不只停留在科技知识落后、人们驾驭自然能力低下的古代社会，事实上地理环境对于一种文明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可以一直延续下来。这当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尤其是在一个民族政治文化的类型特征上，地理环境常常会有直接的影响。

七是重大政治事件。战争、政变、政治运动等重大政治事件会对全社会形成巨大的震撼，会影响到政治秩序运行的正常化；同时，也会给人们的政治价值、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信仰等等带来严重的影响，从而导致政治文化

的变革,甚至会促动政治系统的调整和变化。

政治文化的理论内容很丰富,以上列举的只是其中最一般的规定,以使读者能对“政治文化”形成最起码的了解,以便给以下问题的逐步展开提供认识基础。

## (二) 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

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兴起大约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自 80 年代初以来,随着政治学科在高等院校和研究部门的恢复,西方现代政治学理论姗姗东渐,其中即包括政治文化理论。迄今 20 余年来,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已被学术界广泛认同,研究成果灿然可观。

### 1. 研究的一般状况。

政治文化引进之初,关于“政治文化”的学术归属曾经争讼不已。有人从政治学的角度界定,有人从文化学的层面进行解释,也有人混而言之。20 世纪 80 年代末,政治文化研究形成高潮,论著迭出,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政治学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从研究涉及的问题看,主要分布在以下三个方面。

#### 第一,关于政治文化的界定和基本理论。

界定概念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对于舶来的政治文化尤需如此。从有关的论著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借鉴欧美学者的理论给出定义。G. A. 阿尔蒙德、L. W. 派伊等人的理论界定方式直接影响着中国学者的理论选择,引起人们的效法。例如,有学者提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政治取向模式,包括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情感取向、政治价值取向等<sup>①</sup>。另有学者认为,政治文化分析包括四个变量:政治认知性成分、政治情感性成分、政治价值性成分、政治理想性成分<sup>②</sup>。这类界定的表述形式各有特色,但它们在理论上显然是直接继承了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把政治文化视为“政治理体系的心理方面”。

另一类在借鉴了西方学者有关理论的基础上,参考了苏联学者的观点和文化研究的一般理论,又结合中国学术的传统理论,略作调整变通,概念界定亦有特色。例如,认为政治文化的构成除了政治心理的内容,还包括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有人把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称作观念性政治文化,把政治制度称为实体性政治文化<sup>③</sup>。这一观点显然参考了文化研究的界定方法,即将文化分为观念的、制度的、物质的三层次文化观。有人则坚持认为,在心理、思想和制度的三层次中,政治思想是核心<sup>④</sup>。也有人不讲制度文化,但坚持认为政治文化除了心理

<sup>①</sup> 俞可平:《政治文化概要》,《人文杂志》1989 年第 2 期。

<sup>②</sup> 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9、160 页。

<sup>③</sup> 万高:《简论政治文化》,《政治学》1995 年第 2 期。

<sup>④</sup> 朱日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及其特点》,《政治学研究》1987 年第 6 期。

层面,必须包括政治思想,在结构上分别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层次和政治价值层次;其中,政治意识形态是核心<sup>①</sup>。这一类认识带有某种理论综合的特点,为政治文化理论的广泛研究打开了思路。

在探讨和辨析政治文化概念的过程中,关于政治文化的一般理论也都有所涉及。如政治文化的功能、结构、形成要素,政治文化类型理论,政治文化危机理论以及政治社会化理论等。事实上,正是关于概念的辨析带动了理论研究的深入,有关政治文化一般理论的认识才得以逐渐扩展开来。这些认识基本上限于介绍或复述欧美学术的“他山之石”,尚且谈不上什么理论性的创见。在落后于国际学术研究 30 年的情况下,介绍新学是开展研究的第一步,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否认。

## 第二,关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

运用现代政治文化理论,采用其行为主义实证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问题,无疑是最具时代感的学术成就之一。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初,虽然这一领域的成果数量有限,但其学术价值值得赞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闵琦著《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和张明澍著《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他们的研究最为鲜明的特点是,一改中国学术的传统研究方法,不再是哲学思辨的或历史的、归纳或演绎的逻辑推导,而是采用了经验的实证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分析,依据具体数据得出结论。闵琦说,由于中国政治学的落后,关于分析框架“我不得不老老实实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态度,细心的读者会从字里行间看出阿尔蒙德、费巴、白鲁恂这些政治文化研究宗师以及罗森邦等学者的影响”<sup>②</sup>。然而他们的努力毕竟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尝试,也是中国学术与国际水平的一次“接轨”,目的在于促进中国学术的发展。正如作者所言,在运用“拿来”的理论分析资料数据时,首先是基于自己的“理解和发展”<sup>③</sup>。他们的研究脚踏实地,结论颇具说服力。

例如闵琦在分析中国民主政治难产的原因时指出,首先,中国公民虽然有 75.06% 表示需要民主,“但其适应民主政治的心理准备并不成熟”。人们在认知上并不真正理解民主的内涵,在情感上排拒西方的多元和间接民主制,倾向于一元和直接民主制。其次,中国公民对“自由权的法理学意义认识较少……不善于从制度的深层认识自由问题,也不善于从公民权的角度认识问题。尤其可悲的

<sup>①</sup> 戚玲:《政治文化结构剖析》,《政治学研究》1988 年第 4 期。

<sup>②</sup> 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 页。

<sup>③</sup> 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 页。